

日本亞洲政策的探討

朱少先

一 佐藤亞洲外交的成就

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於去（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結束「日美會談」後在華盛頓「全美記者聯誼會」午餐會中發表演說時，曾宣佈了「太平洋新時代」（The New Pacific Age）的開始。

佐藤首相說：「……由於琉球的收回，已名符其實的結束了戰後的時代；在日本與美國共同合作下，亞洲太平洋地區已進入了爲世界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的新時代。」

佐藤首相這段演說的內涵，實際上與美國前總統詹森所創導的「太平洋時代」（The Pacific Era）和尼克森總統所標榜的「太平洋社會」（The Pacific Community）相類似。都說明了一九七〇年代亞洲太平洋區域的重要性。

在佐藤首相發表上項演說前兩天的十一月十九日，前首相岸信介，在台北出席「中日合作策進會」第十四屆全體委員會開幕典禮致詞中，有下面幾段類似的談話：

「現在正盛行着有關所謂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爭論。它的理由，不僅是今年以至明年期間，琉球、日美安保條約以及越戰等內外重要問題，主要都集中在美國和日本身上，而整個世界，正面臨巨大的轉變期，第二次大戰後的『戰後』時代形將結束，而下一個新時代即將來臨。」

「七十年代的日本，不能再躲在『拒絕的』、『否定的』和平主義的殼裏不動，必須對亞洲有所作爲，並且必須朝向『建設』和『發展積極性』的和平主義，及亞洲的民主主義，而採取創造性的積極行動。爲了完成這種國際任務，在採取行動前，必須擬訂必要可行的計劃。美國

之將退出亞洲已成爲今日之話題，這並不僅僅要爲美國接棒，而是爲了建設亞洲，維持世界和平，我們必須具備更遠大、更切合實際的構想力和堅強的實踐力。」

「日本將以現在在美舉行的『佐藤、尼克森會談』（「日美會談」係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在華盛頓舉行——謹註），作爲『六十年代的結束』，並以預定一九七〇年六月『自動延長』的安保條約，和預計於一九七二年實現的『收回琉球』作爲七十年代開始的第一步驟。再以七十年代第一年舉辦的萬國博覽會所獲的成果和經驗，來激發充實日本人民的自覺和責任感，更加強對經濟自由化的信心。相信於七十年代前半期，即可由現在的『經濟大國』，而成爲『政治大國』，開始採取政治大國應採取的行動。到了這個階段，日本既成了大國，則以往弱小國家在國際上可採取的任性行動，和所謂八面玲瓏的外交政策，不但本身要嚴加慎重，而且內外也將嚴厲要求，必須表現出做一個大國應該作的責任和不應作爲的自肅。如果想到這一點，日本在七十年代前半期，也勢將以內政充實主義爲前提，這是非常必然的道理。」

岸信介是執政黨——自由民主黨元老，曾任日本首相多年，就私人關係上言，又爲佐藤首相胞兄；故岸氏上述發言，事前必已獲得佐藤首相默契，似可視爲一項配合行動，也反映了日本政府今後的政策方向。

當一九六一年池田首相訪問美國，與甘迺迪總統會談後，美國曾要求日本承擔安定亞洲及開發援助東南亞國家任務。其時日本本身國力有限，且東南亞各國對日本宿怨，亦未完全消解，故實際上尚無法負擔上項重任。但自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佐藤榮作繼池田出任日本首相以後，情勢就有了迅速發展。特別在對亞洲外交上，採取了相當積極而堅定的政策，而且也獲得了輝煌

成就。

首先值得稱道的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毅然與韓國簽訂了復交條約，不但解決了自一九五一年以來一直無法解決的懸案，結束了五十年來日韓兩國的宿怨，也填補了亞洲反共防線上的最大缺口。

爲了消解東南亞國家的誤會及推行經濟開發援助，日本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在東京召開了一次包括菲律賓、越南、泰國、寮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緬甸及柬埔寨等九個國家經濟關係的「東南亞經濟開發會議」，商討如何配合美國開發基金，共同發展東南亞各國經濟。由於日本在會議中態度平實，而且宣佈今後將以國民所得百分之一，作爲擴大對外援助資金；因此對解除各國對日本疑懼，頗收到實際效果。更由於該次會議的結果，在同年十一月亞洲開發銀行在東京正式成立，繼之於十二月又召開了「東南亞九國農業部長會議」，翌（一九六七）年四月再在菲律賓召開第二次經濟關係會議，奠定了日本與東南亞各國的經濟合作基礎。

在同一期間，日本外相椎名悅三郎親率代表團出席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漢城召開的「亞洲太平洋區九國外長會議」。雖然在會議前日本曾提出不在會議中強調反共及產生任何形式的反共同盟組織的要求；但在會議期間，日本仍採取相當合作態度。直到現在，日本仍是「亞太理事會」(ASPAC)的重要成員之一。

佐藤本人於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會親自赴韓，參加朴正熙總統就職典禮；在漢城會與韓國總統朴正熙、美國副總統韓福瑞、我國副總統嚴家淦舉行中、美、日、韓四國非正式高層會議，交換亞洲問題之意見。九月七日又單獨訪問我中華民國，與我總統作兩次晤談，商討亞洲及兩國有關問題。

佐藤結束中、韓兩國訪問後不久，又於九月二十日至三十日訪問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寮國；接着在十月八日至二十一日訪問印尼、澳洲、紐西蘭、菲律賓和越南。

佐藤首相執政兩年餘後親自訪問亞洲太平洋區十二個國家，其主要目的

(一)顯示佐藤政府重視亞洲外交；訪問越南尤值得重視。

(二)因中、韓兩國反共態度最堅，佐藤單獨訪問中、韓兩國，除加強兩國關係外，表示日本將採取較堅強之反共政策。

(三)東南亞國家在二次大戰中，均遭受過日本軍閥蹂躪，舊恨未消；日本獨立後與各國貿易交往中，又因過份重視現實，頗爲各國所不滿。佐藤爲了消除各國因二次大戰所遺留的怨仇及爭取各國對日本的諒解與合作，故親自至各國與其領袖晤談。佐藤所到之處，除受到熱烈歡迎外，同時也解決不少與各國間有關問題。足證此行相當成功。

(四)佐藤預定該年十一月訪美，在訪美前先訪問亞太十二國，以此訪問成果，作爲對美談判的政治資本。

從以上一連串事實的發展，足以證明佐藤執政以後是如何重視亞洲外交；也由於日本對亞洲國家關係的加強，使日本的國際地位，蒸蒸日上；與美國的關係，由五十年代的「附屬關係」，進入六十年代以後逐漸擺脫美國而到了「獨立時期」；但到了七十年代的今天，與美國已進入「伙伴時期」。在美國尼克森政府創導「新亞洲政策」的情勢下，日本在亞洲勢將負起更重要的任務。因此，日本的亞洲政策，頗值得加以注意和探討。

二 日本重視亞洲外交的原因

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針是以聯合國爲中心，與自由國家團結合作，以維持包括亞洲在內的世界和平與繁榮。因爲亞洲地區的安全與和平，與日本休戚相關，爲確保該區域的安全與和平，必須團結亞洲自由國家力量，否則日本的安全亦無法確保。這就是日本所以重視亞洲外交的主要原因。上述佐藤執政以來的對亞洲國家所採取善隣政策，即基於此項基本方針而推進的。

在另一方面，日本在經濟上有飛躍的發展，一九五八年的國民總生產，已僅次於美國和蘇聯佔世界第三位，已是亞洲大國，其對維持亞洲安全與和平的責任，也自然加重。事實上，早在一九六一年池田故首相訪美當時，甘迺迪故總統已有意將安定亞洲的責任，交由日本分担；一九六七年佐藤首相訪美與詹森前總統會談，美國在原則上同意將琉球交還日本同時，日本也接受了在亞洲肩負更多任務的使命。

到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佐藤首相第三次訪美，與尼克森總統舉行高層會談後所發表的「聯合聲明」，更明確的說明了日美兩國亞洲政策的重點，下面是「聯合聲明」內容的大要：

(一)對美國在亞洲任務，首先佐藤首相與尼克森總統就國際局勢，特別是遠東情勢發展交換意見後，尼克森特別強調期望亞洲地區各國應作自主努力，以保持此一地區之安定。但美國必遵守在此區域內防禦條約上義務，並為遠東和平與安全繼續貢獻其力量。佐藤首相認為美國保證履行條約義務，對遠東和平與安全極為重要。并且強調在目前情勢下，美軍留駐遠東，對該區域的安定，關係極為重要。(原聲明第三項)

(二)對韓國問題，佐藤首相與尼克森總統同時認定朝鮮半島緊張狀態依舊存在；佐藤除對聯合國為維持韓國和平所作努力評價甚高，並表示韓國的安全，對日本本身安全極為重要。

(三)對「中共」問題與中華民國關係，兩國領袖一致期待「中共」在對外關係上，採取更合作和更具建設性態度。對中華民國，尼克森總統重申遵守條約上義務。佐藤首相亦表示維持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是日本安全的極重要因素。

(四)對越南問題，尼克森總統說明美國努力和解決越南問題的誠意。雙方強烈希望越南戰爭能在一九七二年美國將琉球行政權交還日本前結束。

佐藤首相並表示日本願尋求為越南地區安全所負擔的任務。(以上聲明第四項)

(五)對日美安保條約，兩國領袖鑑於遠東現狀與前途，認為日美安保條約對維持日本在內的遠東和平安全極為重要，基於互相信任與對國際情勢的共同認識，聲明必須維持此項條約。(聲明第五項)

(六)對琉球問題，基於日本國民之希望及日美友好關係，雙方決定在不損害包括日本在內遠東和平情況下，磋商在一九七二年將琉球交還日本。但佐藤首相表示，在目前情勢下，駐琉球美軍負有重要任務；日本收回琉球後，基於兩國共同安全保障上所必需的軍事設施及基地，根據日美安保條約，繼續由美軍保持。(聲明第六項)佐藤首相認為如無遠東和平與安全，日本安全無法維持，因此，日本收回琉球後，美國為有效履行防衛包括日本在內遠東各國之條約義務時，將不採取妨礙行動。(聲明第七項)

除了上述聲明中，日美兩國特別重視朝鮮半島及台灣地區的情勢外，佐藤首相更強調了韓國與台灣地區的安全對日本安全的重要性，佐藤首相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全美記者聯誼會」午餐會演說中，更進一步作了具體的闡明

；佐藤首相說：

「……………如果韓國受到武力攻擊時，對日本安全將受到極大影響；因此，萬一韓國發生武裝衝突，美軍為對付此種情勢，不得不使用日本國內設施及基地作為戰鬥行動前進基地時，日本政府基於上項認識，在實施『事前協議』時，決定採取積極而且迅速的態度。」

「……………維持台灣地區和平為日本安全重要因素，本人對美國決心履行對中華民國條約上義務，十分重視。萬一不幸台灣受到外來武力攻擊，實際上不得不發動義務時；因此項情勢，可視為威脅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和平與安全。因此，美國履行對台灣條約義務時，就日本而言，基於上述對國家利益之認識，自應考慮採取適當對策。幸而此類事件，尚不致發生。」

從以上日美會談聯合聲明及佐藤首相演說，日本亞洲政策重點，指向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極為明顯。

我們再從尼克森總統今(一九七〇)年二月對國會所提出的外交報告中，美國對日本是如何重視與期待。尼克森總統說：

「美國與日本的合作，對美國努力促進亞洲各國的和平發展，有決定性作用。美日兩國的伙伴關係，是尼克森主義在亞洲能否成功的關鍵。」

「美國在亞洲的友邦，其中尤其是日本，佔有能承擔促進該地區和平進步責任的地位；雖然過去困難重重，但對亞洲的將來，仍充滿了希望。……………」

尼克森總統的重視日本，在其一九六八年底競選時，早已坦率的在記者招待會中表示過說：「日本已是亞洲工業大國，應該有領導亞洲的能力。在十年前，從亞洲各國對日本的感情上看，尚無可能；但現在亞洲已進入了新的時代，對日本的頭腦與企業能力，都表歡迎」、「交還琉球問題與亞洲集體安全保障中日本的責任問題有密切關係；……………日本既成爲經濟大國，爲了維持亞洲的均衡，無論在外交上、經濟上、政治上乃至軍事上，自應承擔更重要的任務」。(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朝日新聞」)

由於美國重視日本在亞洲的地位及期望日本在亞洲承擔更重要的任務，所以在繼續維持日美安保條約及交還琉球條件下，在日美會談聯合聲明中，

日本表明了亞洲政策上，特別是對韓國及中華民國政策上的積極態度。事實上，日本既是亞洲自由國家的一員，必須與所有亞洲自由國家團結合作，始能確保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和平與繁榮。是維持日本安全的必要條件，也是日本重視亞洲外交的重要原因。

三 從「外交藍皮書」看日本亞洲外交

日本的外交動態，可從外務省一年一度所發行的「外交藍皮書」見其梗概。一九六九年度（一九六九年四月至一九七〇年三月）日本外交概況，已於本年七月七日正式發表。全書分為「世界動向」與「日本外交方針與各國關係」兩大部分。

在「世界動向」一章中，以分析美國與「中共」及蘇聯間的關係為主，說明整個世界動向；第二部「日本外交方針與各國關係」中，則以日本與美國關係為重點，再逐一敘述與中、韓、越三國為中心的亞洲各國的關係。最後並涉及與亞洲各國經濟合作現狀和聯合國與裁軍外交動態。

統觀全書，關於亞洲外交部分，仍佔絕大部分，這裏也反映了日本重視亞洲外交的趨向。

下面對「日本外交藍皮書」內容，加以摘要敘述：

(一)世界動向：整個國際局勢，因美俄仍維持「和平共存」關係，故無多大變化。蘇俄雖然一面急速發展洲際飛彈，但在另一方面在赫爾辛基參加「限制戰略武器談判」(SALT)並提出「禁止設置海底核武器」案，與美國採取相當協調態度；在中東方面，阿拉伯與以色列的對立形勢仍非常嚴重，且到了高度危險狀態。蘇俄對美國與「中共」的接近非常關心；美國尼克森政府雖然曾宣佈放寬對「中共」禁運限制等，但「中共」以「美國帝國主義」與蘇俄修正主義為最大敵人的基本政策，仍未改變。其所以接近美國旨在牽制蘇俄作戰略運用。匪俄關係，在去年八月以前雖有「中共」與蘇俄邊疆武裝衝突事件，但以北越胡志明死亡為契機，促成了柯錫金與周恩來會談，此後雙方武裝衝突事件，未再重見，似均在避免紛爭的擴大。至於「中共」

情勢，自「九全大會」以後，雖已結束了「文化大革命」與「奪權鬥爭」，且已確立了「毛林體制」，但內部情勢，仍非常混亂。今後勢將在內政方面謀求黨政組織正常化；在外交一面繼續對外擴張，一面仍標榜「和平五原則」。

關於越南戰爭，因美國全面停止轟炸北越，已進入了一個新的局面。「巴黎和談」因撤兵及聯合政府問題意見對立，迄無任何進展，十二月以後，因美國首席代表辭職及北越首席代表不出席會議，和談事實上已陷於停頓狀態。美國方面，則遵循尼克森總統的「關島主義」方針，推進「越戰越南化」。

(二)日本外交與各國關係：在本章中，外務省當局先預測日本在七十年代仍將繼續經濟高度成長。因經濟大國必須負起經濟大國的國際任務，同時因對外擴張所引起對隣國的磨擦與不必要的誤解必須消除，故成了外交上兩項重大課題；因此日本外交基本方針，透過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的合作，積極推進與自由國家的善隣、友好外交。但一國外交政策的基本課題，是確保國家與國民的安全；因此，除了增強本身防衛力量外，不足部分，將藉安保條約予以輔佐。至於與各國關係，首重加強對美關係。外務省指出過去十七年來，日本藉日美安保體制，確保了日本的安全與繁榮；故日美安保條約，為防止日本遭受直接侵略及維持遠東和平不可或缺的條件；日本政府今後仍將繼續維持此項體制，並作有效運用。對美國經濟關係，因日本對美貿易佔對外貿易三分之一，故必須避免日美間的經濟紛爭。對中華民國，今後仍採取維持友好合作關係之方針。日本並認為維持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反對任何對台灣行使武力的行動。對於「中共」，因基於與中國大陸的歷史深厚關係及中國大陸八億人口的存在，故日本期望「中共」在對外關係上採取更合作和建設性態度，在相互尊重立場原則下，促進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對韓國，日本認為韓國的安全與遠東安全有密切關係，對日本安全極為重要。故美國對確保該地區安全的抑止力，功效至大。日本又認為一個國家的安全保障，基於該國的政治安定與經濟發展，因此日本政府對韓國經濟建設繼續採取密切合作方針。對越南實現和平過程中，日本政府將加強援助，以求其民生安定；在越戰結束以後，對越南及其隣近各國，在國際合作下，將盡一切可能援助其復興工作。

關於推進亞洲地區區域合作問題，日本政府將進一步充實「東南亞開發關係會議」及「亞大理事會」之功能；並加強聯合國「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及「亞洲開發銀行」。同時並考慮促進與亞洲各國友好關係及謀求亞洲全區域的經濟發展。

在經濟合作方面，日本政府一九六九年約提供了四億美元的合作資金（官方的），較一九六八年的三億六千萬美元增加四千萬美元。大部分係貸與大韓民國、中華民國、印尼及菲律賓。另以一億美元資金，作為對亞洲各國賠償及無償經濟援助之用。對越南、寮國、泰國等新經濟開發特別援助資金，因各國計劃提出過遲，未及在一九六九年中支付。技術合作方面，規模亦不大。

從以上「外交藍皮書」中所顯示的日本一九六九年度外交動態，係以日美會談「聯合聲明」內容作為基本方針，而在與美國密切合作下，積極展開亞洲外交為重心。

四 日本亞洲政策發展方向

日本今後的外交政策，仍以加強對美關係為核心，在美國支持、合作下，積極展開對亞洲外交。其政策方向，將朝下列兩個目標推進：

在東北亞方面以一九七二年收回琉球為中心，展開對韓、對華政治外交，列為政策重心。從本（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第四次日韓部長級會議中，我們已可以很清楚看出，日本與韓國的關係，已邁入了新階段。因為這次會議召開之前，美國根據尼克森總統「關島主義」原則，正式通知韓國政府，要撤減駐韓美軍二萬人。在目前北韓積極備戰，韓戰隨時有再度爆發可能的緊張情勢下，美國撤軍措置，自對韓國安全影響極大。日本在去年日美會談中，特別強調了「韓國安全對日本本身安全極為重要」，現在既面臨了此項有關韓國安全的實際問題，在本次會議中，非有所表示不可。根據外電報導，崔圭夏外長曾向日本提出了下列三項要求：（一）韓國堅決反對美國在此時撤減駐韓軍隊，要求日本予以全力支持；（二）基於遠東情勢，琉球美軍負有重要任務，為了韓國安全，琉球美軍基地價值不能使之降低；（三）要求日本給予大量資金援助，以發展軍需工業，加強韓國防衛力量。

由於日本受和平憲法限制及國內左翼勢力牽制，對上述要求，勢無法作正面答復；韓國對日本立場亦頗為同情與諒解。因此在會議「聯合聲明」中，僅強調「日韓兩國安全與繁榮，有密切不可分割關係」及「在目前狀況下美軍在遠東的存在，為本區域安全所繫」。雖然表達方式抽象，但確已暗示了反對美國自韓撤軍的意向；但在另一方面，當愛知外相管見朴正熙總統時，曾表示「日美聯合公報精神迄未改變」，間接對韓國安全問題，提供了保證，使韓國獲得了滿足。在經濟援助方面，在日韓聯合聲明中，已載明日本貸與一億美元，作為協助推進韓國第三次五年經濟建設計劃（自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之需；在聯合聲明之外另一筆六千九百萬美元的新借款，係協助韓國建設重機械工廠，特殊鋼工廠，造船廠等軍需工業之用，此項計劃，將由兩國繼續商討。故此次日韓部長會議的結果，除了日本仍遵循「日美會議聲明」原則外，在經濟上已開始肩代了美國的責任，而且還是以間接方式給予「軍事援助」。顯示了日本對韓政策的積極性。

對中華民國政策，亦以經濟援助為主，除了原則上已同意簽訂三億美元新借款外，對反共政策方面，與我國觀點已漸趨一致，從最近一次「中日合作策進會」的成就，可加以證明。今年聯合國大會中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日本亦已決定作為重要事項處理，並仍舊擔任提案國。

在東南亞方面，則以經濟外交重心，展開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援助與經濟合作。由於日本國民總生產已由一九五一年的一五〇億美元，一九六〇年的四五〇億美元，至今（一九七〇）年將達二〇〇〇億美元，已佔了世界第三位；因此今後必將加速對亞洲國家的經濟援助，以促進該地區的發展與繁榮，遏制「中共」對東南亞地區的擴張。但去年日本對外援助實績僅約十三億美元，在比例上，較其他先進國家為少。今年四月福田藏相曾表示今後五年間將增加一倍，愛知外相也在今年五月表示，一九七五年將以GNP的百分之四〇億美元，作為援助資金。雖然目前尚未定案，但日本政府正朝此方向推進，毫無疑問。不過日本過去對亞洲援助，政府援助數額過少，無償援助與贈與者更為有限，加以借款條件甚苛（一九六八年平均利息三·七%，償還期一八·一年），對受援者獲益不大。

此外在對亞洲各國貿易，去（一九六九）年輸出實績四十四億美元（未

題及青年的示威遊行等問題，這些都是很難以處理的問題，需要審慎與沉着應付，而不是高壓或斷然的行動；如果處理不當，可能使一個政府垮台。毛氏的個性雖剛強，但他不屬於右派，且具有處理青年及種族問題的特長。此次奧斯首相雖未設置副相職位，但一旦首相出國或因故缺席時，仍將由毛氏以保守黨副黨魁資格代行首相職務。

休謨出任外相，對任何政府都是一種力量。外交事務應由外相主持策劃一切，有像休謨這樣的人來担任此一職務，保守黨政府有了一個在國際間已經知名外相，不但可以增強英國在國際事務方面的發言權與影響力，而且可為首相分勞而節省時間，因為時間是首相最寶貴的東西。

麥克里奧將是各方的最為關切的財相。此次保守黨既以經濟為號召而擊敗工黨，則麥氏的所作所為將影響奧斯政府的成敗。為了歐洲或共同市場的理由，麥氏可能引進現在西歐盛行的增值稅（Value Added Tax）；但他可能先對消耗稅（Expenditure Tax）作詳細調查，主要是使稅制與獎勵儲蓄節約相輔相成。走筆至此，消息傳來麥已因心臟病逝世。財政大臣是新閣最重要職位，麥氏素以敢作敢為見稱，各方正期待他能為積弊極深的英國經濟有所興革，他自己也抱着「跳火坑」的精神接受這一使命；但長才未展而中途凋謝，誠屬可惜！有一點似可確定，無論何人繼任財相，麥氏的減稅與改革稅制主張，仍將是新政府的政策。

冶金工人出身的卡爾被任為就業與生產大臣，來執掌過去勞工部的職務，這是一項不平常的任命。卡氏的首要任務是向國會提出勞工改革法案，並設法使其通過。這的確是一項大膽的嘗試，因為英國工會的蠻橫與跋扈是人所共知的，無論保守黨或工黨都對它懼怕三分。保守黨改革工會的主張雖獲得識者的支持，但如何說服工會以及多數與工會深相結納的工黨議員，要他們以國家利益為重而不去阻撓此一法案的通過，則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新政府為此，尤以卡爾的使命，將面臨考驗。以目前情勢觀察，改革工會是勢所必行，保守黨如能發揮高度的政治智慧，帶領全國民意與輿論作為後盾，使此一立意完美的新法案能在國會順利通過而不陷國家於分裂，此為上策。因此，卡氏可能成為新政府的中心人物，尚在未來數年，能對改革工會有所成就，則他的政治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卡林頓爵士出任國防大臣，如此則國防部一個較低職位的官員將負責出

席下院發言。新任國防大臣的首要任務是與澳、紐、星、馬等國商討英國駐軍問題。種種跡象顯示，保守黨雖強調在「蘇彝士以東」保留駐軍，但亦止於象徵性而已，駐軍的實際人數將較前減少。要之，英國在東方保留駐軍，其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對維持這一地區的和平仍有貢獻。

總之，就整個內閣來說，閣員的人選與經驗都相當優異，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有內閣經驗，其上層人物，包括奧斯、休謨、毛德林及麥克里奧（已逝世）等，都是一時之選，是一個非常堅強的陣容；至於那些年輕的次要閣員，人們也可以期待他們具有良好的行政（Good Administration）表現。良好的行政效率在政治上也是十分重要的，奧相本人重視這點，當然他也希望別人如此。但，新閣的潛在隱憂可能是表現在行政方面的色彩太強而忽略了政治機智（Political Skill）。在奧相這批人選中，差不多都是苦幹實幹出身的人物，除休謨與毛德林二人外，別人就看不出具有任何真正的政治美感（Real Political Virtuosity）。現代民主政治、政策的善加宣揚解釋與它的善加執行具有同樣重要，有時前者甚至較後者更為重要。例如，新政府正致力於實施工會改革，要使此一立意完美的改革順利進行，這不是行政效率問題，而是政治美感或政治機智問題。

註：麥克里奧逝世後，財相的繼任人選可能是毛德林，但迄脫稿時尚未見正式發表。

——上接第37頁——

包括共產國家），輸入二十三億美元，赤字達二十一億美元之多，故亞洲國家普遍入超，發生貿易不平衡現象，因此頗表示不滿與指責。

如果上項缺點不圖謀改善，日本在經濟外交上，勢將遭到不良後果；甚至至有被指為經濟侵略，及所謂「軍國主義復活」的惡評。

正如岸信介所說：「日本既成了政治大國，則已往弱小國家在國際上可採取的任性行動和所謂八面玲瓏的外交政策，不但本身要嚴加慎重，而且內外也將嚴厲要求，必須表現出來做一個大國應該作爲的責任，和不應作爲的自肅」。今後日本在積極推行亞洲政策時，都應該有這種遠大的抱負。只有這樣，才能獲得亞洲自由國家及其人民的同情與支持，達到亞洲和平、繁榮的目的。